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胡頌平 編著

校訂版 ● 第七冊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七)

胡頌平・編著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甲午 六十四歲

二月九日 先生在紐約接見「中央日報」的記者說，他將回國參加國民大會，乃是尊重並維護憲法的法統。對於李宗仁抨擊召開國大事屬違憲一端，連呼李宗仁糊塗不止。他認為二月十九日開幕的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改選正副總統，乃是尊重並繼續中華民國法統的唯一合理措施，完全合乎憲法的正常途徑，決無違憲之處。

對於自由中國今後的途向，胡先生認為最重要的是自己把得穩，站得住，樹立與共產黨獨裁專制完全相反的風氣，厚植自由民主的根基，一以爭取大陸的民心，二以廣引世界的同情。如此，內有民心之所向，外有自由世界的支持，自由中國的發展，大陸赤色政權的瓦解，乃屬必然的推演。胡先生指出，此次反共義士返臺，可為大陸人心歸向祖國的明證。（四十二年二月十六「中央日報」紐約九日航訊）

二月十日 有「言論自由與社會安寧之衝突」一文，是在返國的前夕才趕寫完成。（見王理

璜「記胡適博士閒談」，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四版）

二月十一日 先生離開紐約，經舊金山、洛杉磯稍事停留，再赴臺北。他的主要目的，是他對自由中國反共政府及反共力量的支持。（四十三年二月七日〔中央日報〕紐約專電）

二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先生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機，由東京飛抵臺北松山機場。朝野友好到機場歡迎的，三百多人。到了福州街臺大校長錢思亮的家裏。兒子祖望媳婦曾淑昭已住在那裏。見了晚報外勤記者多人。

中午，應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之邀，在聯合國同志會午飯。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趕來說，明天的國民大會開幕，要先生做主席。（見當時的「簡單日程紀錄」）

下午三時四十分，先生親到國大報到處，領取報到表，卸下眼鏡，用毛筆填寫。填畢，笑對圍觀的一羣記者說：「我們可以交卷了！」遂由洪蘭友秘書長陪同「突圍」而出，回到錢公館接見中外新聞界人士。先生對記者說：

此次召開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改選總統、副總統，完全是一種合法、合理的措施。國家處此非常時期，總統副總統任期即將屆滿，如何產生一個合法的政府來處理國家大政，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在此非常時期有什麼合法、合理的方式達到此目的呢？我個人想來想去，覺得召開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是最合法、合理又適應當前情勢的辦法，只有循此途徑才能維護憲法的法統。

對於中國國民黨推定蔣總統及陳誠院長為正副總統候選人一點，據胡博士發表感想稱：他十二萬分贊成。他所持的理由是國家處境艱難，除蔣總統以外，沒有人比蔣總統領導政府

更爲適當，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復國建國的歷史使命。對於陳誠院長爲副總統候選人，據胡博士評論說，他於去年三月和友人作私人談話時，就曾提出過此一主張。他認爲陳院長是蔣總統最適當最理想的助手。他所持的理由是，在年齡上說，總統最好比副總統大十歲；現在陳院長比蔣總統恰好小十歲。在健康方面，過去有人以爲陳院長的身體不好，但他前年回國時發現陳院長的健康情形相當良好；而陳院長的太夫人享壽八十高齡，據生理學上的記錄，長壽是有遺傳性的，所以他的身體足能勝任；過去四年來的政績輝煌，又能任怨任勞，對政治有極深刻的認識，所以他是最適當的副總統候選人。

當有人告訴胡博士，在國民黨臨全會中，蔣總統曾推薦胡博士爲總統候選人一事時，胡博士說，他在返國途中，曾有人告訴他此一消息，他認爲這是蔣總統的謙讓，對於蔣總統的好意，他非常感謝。他說他是個有心臟病已達十五年歷史的人，連人壽保險公司都不願保他的壽險，怎能挑得起總統這副擔子？他希望朋友們不要浪費精力，替他簽署。有人問，假如有代表不得其同意而簽署提名甚至當選，又將如何？胡博士幽默的答覆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佈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胡博士說他此次回國出席國民大會，除將投神聖的兩票選舉總統副總統以盡代表及國民的天職外，不擬在大會上發表任何意見，也不準備提任何提案。

胡博士在接見新聞界時，對於他不參加總統及副總統競選的理由曾再三說明。他說他雖未老態龍鍾，但他的心臟病不允許他負如此重大的責任；況且國家處此艱難困苦期間，非能打

仗的軍人不足以領導政府。他只是個讀書人，他說：「過問政治不一定要做官。讀書人談政治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從孔孟時起直到現在，都是如此。例如『論語』裏說：『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孟子的『以天下爲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及顧亭林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此種精神的表現。他說他過去辦雜誌，辦報紙，對政治有意見，即直言無隱。他願意爲國家作諍臣，爲政府作諍友，不願居官。他過去任駐美大使，也只是玩票性質；但他說他那以天下爲己任的讀書人氣質，從未改變。他說六年前在南京時，他也曾經受到蔣先生誠懇的勸勉，要他競選總統。」

對於副總統是否能兼任行政院院長的問題。據胡博士解釋他個人的觀點稱：「他認爲這是憲法上的疏忽。副總統的兼職，憲法上既無明文規定禁止，也沒有規定可以兼任。他在制憲國大時就察覺到這一點，在憲法草案二讀完成那一天，就覺得憲法草案未規定副總統應做些什麼事。當時他起立發言，想替副總統找點事做。大家說：『這個問題用不着談』。他也只好閉口不言了。他想到舊事，還不無遺憾之感。他覺得副總統既有其崇高的地位，就應該給他負相當重要的責任，像美國的副總統，係兼參議院議長。他認爲我國的副總統除立法、監察兩院以外，只要總統肯提名，就可以兼任行政、司法、考試等三院之中的任何一院院長。他說他剛返國門，未和任何人交換過意見，所有有關政治的意見和言論，都是他個人的見解。談到反共救國會議，他說不能參加。他希望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結束後離臺赴美，參加他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年紀念大會。對於反共救國會議的重要性，他不願置評。他說漢

武帝時的申公曾說，「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如拿來批評反共救國會議，即「反共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他聲明這是他個人的意見，而且是從他個人想規避此會的觀點出發。（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日報〕）

關於罷免李宗仁副總統的問題，胡博士答覆新聞界人士稱：「美國有句俗話說：『不要在公衆面前洗滌臭氣薰天的裹脚布。』」他認爲此問題最好在此次國大裏不要提出。他說：「李先生的政治生命和副總統的任期只有九十天就要同時終了，爲了國家的名譽計，最好不提。」（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日報〕）

晚上寫明天的演說稿。

二月十九日 上午十時，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中山堂舉行開幕典禮，先生擔任臨時主席，致開會詞：

今天是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的開幕典禮。我昨天剛從國外趕到，就聽說各位同仁要我擔任今天的臨時主席，這是最大的光榮，我很誠懇的感謝各位同仁的厚意。

臨時主席的任務是宣布開會，所以我想簡單報告這一次會議的歷史的意義。

八年前召集的國民大會，是「制憲」的國大。六年前召集的國民大會，當時人都叫做「行憲」的第一屆國大，我覺得「行憲」兩個字很可以表示我們這第一屆國大的歷史的任務，也很可以表示我們這第一屆第二次大會的歷史任務。

第一屆國大的第一次會，選舉了憲法頒布後的第一任總統副總統，由總統依據憲法提出行政院，組織憲

法之下的第一個政府。

現在總統副總統的任期只剩九十天了。在國家蒙受歷史上空前的大危難的時期，憲法的法統不可以中斷。所以今天的第一屆國大的第二次會議的召開，是繼續維持憲法的法統，依據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舉行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有人曾提出疑問，第一屆的國民大會可以兩次選舉總統副總統嗎？我們毫不遲疑的答覆：正因為我們是行憲的第一屆國民大會，所以可以選舉兩次總統副總統。就是在國家太平時期，第二任的總統副總統還是應該由第一屆的國大選舉出來的。第三任的總統副總統才應該由第二屆的國大選舉。因為第一屆國民大會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開會的，他的六年任期要到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才滿。第一任總統副總統是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就職的，依據憲法第二十九條：「國民大會於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日集會」，第一任總統任滿前九十日是今天，正在第一屆國大六年任期之內。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條說：「每屆國民大會，應於前屆總統副總統任滿前六十日舉行總統副總統之選舉」。這裏說明「任滿前六十日」、無論如何解釋，也在第一屆國大六年任期之內。

所以我們說，第一任總統「任滿前九十日」，「任滿前六十日」，都在第一屆國大六年任期之內。所以第二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是第一屆國大的任務，似乎不應該有疑問的了。

至於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之日為止」，這一句憲法條文，已經有大法官解釋，已經成爲這一次召集第一屆國大第二次會議的根據，更不用我們多說話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集會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憲法的根據的。我們這一次開會的任務是依據憲法，舉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使憲法的法統可以維持繼續，不至於中斷。

但是我們今天回頭想想，這個憲法的法統的維持繼續，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在我們的大陸上，這個法



統被共產黨用暴力毀滅了，我們能在今天在這一片乾淨美麗的土地上，保持這個憲法的法統，第一，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總統蔣先生，當日的臺灣省主席今日的行政院長陳先生，同許多忠貞的將領戰士，給我們保存了這臺灣省做我們自由中國的根據地。我們大家試回想民國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的危險、艱難、苦痛，我們都可以深刻的承認，若沒有臺灣，也就沒有這樣憲法的法統了。第二，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的許許多多的忠貞的文官，忠貞的公務人員，忠貞的國民，在這幾年最困難的環境之中，維持住這一個政治經濟規模，使五權的憲法得以繼續行使，使人民的生活得以繼續存在，繼續維持。第三，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自己的一千三百多位國大同仁，他們拋棄了他們的故鄉從九死一生的苦難裏逃出來，來到這臺灣寶島，受到種種生活上的困難痛苦，爲的是要維持這個「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的國民大會。我們試想，若沒有這一千三百多位忠貞國大代表，我們今天還能繼續維持這個憲法的法統嗎？我們今天還開得成這第一屆國大的第二次會議嗎？所以我們說，維持這個憲法的法統，真是不容易的事。……現在請我們敬愛的總統蔣先生給我們講話。

——四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國民大會實錄〕第二編

此次講詞有英譯文，在〔自由中國月刊〕四卷四期上發表。（*Free China Review*, Vol. 4, April, 1954, pp. 63-65. 〔西文著作目錄〕二二八號）

蔣總統在大會臨時主席致開幕詞後，向全體代表致詞，並就六年來政局的演變向大會作總報告。詞畢，韓境歸國反共義士一萬四千餘名，派代表五十人，手持各省市地圖型標牌進入會場，推定代表向大會致頌詞，並將頌詞遞給大會主席接受。

先生對反共義士致答詞：

各位反共義士代表：

剛才你們代表一萬四千反共義士給我們致頌詞，我很難表達我的誠懇意思。我們看到了反共義士，更使我們想到大陸上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在血海中受苦難，你們告訴我們說，你們一進國門就躬逢國民大會開會的盛典，給你們很大的興奮。我很誠懇的代表今天一千四百五十五國大同仁感謝場內反共義士代表及場外的一萬四千反共義士。

我剛才在開會致詞中特別提到你們冒很大的危險，個人的危險及留在大陸上的家屬的危險，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你們說我們開會給你們很大的興奮，我要誠懇的說，你們的回來，不僅給一千四百五十五國大代表以很大的興奮，給臺灣八百萬同胞以很大興奮，也給大陸同胞寄與莫大的期望。你們的回來是自由意志的表決。你們選擇了自由，給自由中國及自由世界莫大的興奮。你們的回來，是自由中國將來必定勝利最好的鐵證。

我代表國民大會感謝各位反共義士代表，請你們反共代表把我們的意思轉達給一萬四千反共義士同胞，國民大會秘書處已替我們準備了一點小小紀念禮物贈送給每一位反共義士，請你們告訴每位反共義士同胞，請留下這小小禮物，作我們說不盡、表達不盡的一點點誠意。謝謝各位。

——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國民大會實錄〕第二編

大會禮成後，蔣總統出臨陽臺，接受一萬四千反共義士之歡呼。

下午，曾謁蔣總統，晤敘近一小時。（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二月二十日 國大二次會議首次預備會。

是晚六時，自由中國史學界人士羅家倫、董作賓、李濟、蕭一山、沈剛伯、但燾、毛子水、黃純青、姚從吾、劉崇鋐、蔣復璁、郭廷以（一九〇三—一九七五）、張貴永（一九〇八—一九

六五）、牟潤孫、程光裕等三十餘人，假臺北賓館歡宴先生，並即席發起組織中國歷史學會，並定三月七日爲中國歷史學會成立日期。

會中首先由張其昀致詞，繼由方豪（一九一〇——一九八〇）報告籌備經過。接着請先生致詞。當時的紀錄是：

胡先生對於自己能於返回祖國之初，即列名中國史學會發起人，感覺光榮。繼對近年來臺灣史學界朋友，在艱難困苦中所有之驚人成就，表示欽佩。並報告在美接洽募款，爲現存臺灣珍貴史料攝製副本經過。最後，以過去有人曾認爲漢學中心在巴黎，或以爲在京都，或以爲北平，但近年法國漢學界已經凋零，日本東方學研究情形，亦大不如昔；大陸共匪更只知毀滅史料，改造歷史，而以漢學中心當在臺灣，爲中國史學會預祝。（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

今天接見客人很多。有不少學術團體和學校邀請先生作公開的學術演講。先生在返國的那一天曾告訴新聞界人士說：希望除了出席國大以外，不作任何公開的學術演講。並談起四月初趕回美國，出席哥倫比亞大學二百週年紀念會，將要作兩次的學術演講。（參閱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的〔中央日報〕）

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曾至親友處拜訪。下午在寓會客，蔣夢麟、嚴家淦、蔣經國、谷正綱、毛子水、張茲闓等均往拜訪。駐美大使顧維鈞之公子顧德昌夫婦，特從臺南趕來拜訪。（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

二月二十二日 國軍舉行「軍帖演習」，蔣總統親臨校閱。先生應邀參加閱兵。（見當時的簡單日程）

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先生被推定爲國大主席團候選人。（「國民大會實錄」第二編）

下午七時，應沈怡夫婦之宴。（當時簡單日程）

二月二十四日 國大第二次預備會，先生當選爲主席團主席之一。（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

二月二十五日 出席國大主席團會議。主席團共分十組，先生屬第四組。（「國民大會實錄」第二編）

下午七時，應吳南如之宴。

今天有「遊仙小詩，祝黃晴園（純青）八十大壽」：

先生同我都曾親見桑田變成了滄海，

也都曾親見滄海還變成了桑田。

今天我舉杯敬祝先生努力加餐飯，——

收復河山，痛飲天津橋上，同醉秦淮河下，就在明年。

——有親筆詩稿，記在簡單日程上

二月二十六日 上午，出席國大主席團臨時會議。關於監察院向大會提出彈劾李副總統一案，通過國大致李副總統電文，促請從速回國答辯。（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

下午三點，出席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共同理事會。先生帶了給美國國會圖書館請款書稿，又帶了 Toronto Museum 兩書去，提出討論。

六點，參加黃純青八十壽宴後，又參加行政院全體閣員的晚餐。席間安徽籍國大代表吳忠信請先生代表向主人道謝。先生致詞：一年以前有人論及副總統人選時，當時即認為必須比總統年輕，有資望，對國家有補助，為政有成績而得人望者為副總統。陳誠院長之被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實深合此項條件，因此祝陳院長能當選為副總統。（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又見當時簡單日程）

是夜，有「〔四十自述〕自由中國版自記」。大意是：

……〔四十自述〕的前六篇，敘述到我十九歲考取官費出洋留學時，就沒有寫下去了。當時我曾對朋友說：「四十歲寫兒童時代，五十歲寫留學時代到壯年時代，六十歲寫中年時代。」

但我五十歲生日（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正是日本的空軍海軍偷襲珍珠港的後十天，我正在華盛頓作駐美大使，當然沒有閒工夫寫自傳。我的六十歲生日（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正當大陸淪陷的第三年，正當韓戰的第二年，我當然沒有寫個人自傳的情緒。

在抗戰之前，亞東圖書館曾把我留學美國的七年日記排印出來，依我原題的書名，叫做「藏暉室劄記」。這四冊日記，在抗戰勝利之後，改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改題作「胡適留學日記」。這是我留學時代的自傳原料。「逼上梁山」一篇，寫文學革命運動的緣起就是根據留學日記的資料寫的。

今年我回到臺北，我的朋友盧逮曾先生同他的夫人勸我把「〔四十自述〕」六篇在臺灣排印出版，加上「逼上梁山」一篇，仍題作「〔四十自述〕」。他們的好意，使這幾篇試寫的自傳居然有一部自由中國版，這是我很

感謝的。我六十年前，曾隨我的先父、先母，到臺南、臺東，住了差不多兩年。甲午中日戰爭發生時，我們一家都在臺東。今年又是「甲午」了，我把這一部臺灣版的「自述」獻給自由中國的青年朋友。

——〔四十自述〕臺北六藝出版社，以後改由遠東圖書公司出版

二月二十七日 來訪的客人有吳忠信、鄭介民、芮逸夫、高去尋等。紐約時報記者Spencer Moosa 來談。

晚間，應錢用和、孫繼緒、江俊華、周敏、江學珠、蘇雪林等之宴。（以上均見當時的簡單

日程）

二月二十八日 蕭一山約去板橋午餐。晚七時，蔣夢麟家飯。

三月一日 出席國大第一次大會。晚應楊亮功之宴。

三月二日 上午，端木愷來談。午，陳啟天邀宴。下午，臺大醫院院長高天成，約先生到醫院去診視，作了X光胸部影片。晚應臺大教授之宴。

三月三日 上午，出席國大第二次大會。午十二時半，藍欽大使宴。下午六時，張其昀宴；七時，何應欽宴。八時半，出席國大主席團第四次會。

三月四日 中午，鄧傳楷宴。下午六時，中國公學校友會公宴。

三月五日 中午，陳誠宴。下午四點，出席「自由中國半月刊社」的茶會，參加人士四百多人，先生有「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的演詞：

我很高興，剛剛過了一年，我又有機會回來同「自由中國」的許多朋友見面。……

順便我要先報告一句話。今天上午美國舊金山有電報來打聽我。他們聽到：因爲我於二月二十七日在臺北接見「紐約時報」記者發表了一些話，就在臺灣被軟禁起來了，行動不自由了。我當時就回一個電報說：還有二十分鐘，我就要到陳院長那邊吃飯去，下午還要到在裝甲兵俱樂部舉行的自由中國社茶會上發表演說。我借這個機會報告各位，胡適並沒有被拘禁，行動還是很自由。

二月二十二（六）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爲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一九一九——一九六九）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F. A. Hayek，原係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臺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爲這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以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劃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來以爲：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出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現在臺灣的經濟，大部分都是國營的經濟，從理論與事實上來說，像海耶克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很不中聽的。但不僅「自由中國」在最近七、八期中繼續登載海耶克名著的譯文。另外我又看到最近一期「中國文摘」中，轉載了「中國經濟」第三十九期的一篇文章——高叔康先生所撰的「資本主義的前途」。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海耶克及另外一位經濟學家方米塞斯（Von Mises）。這都是反對計劃經濟，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中國」，我不用替他登廣告了；我記得高叔康先生在這篇文章裏以爲我們現在「對於資本主義該有個重新的估價，作爲將來經濟制度應走什麼方向的一面鏡子」；這應該是我們當

前在精神上、認識上最重大的急務。」最後，他在結論中說：「我以為資本主義不但不會崩潰，而且還有光明燦爛的前途。」

這些議論都可以表示自由中國有一班政治的、經濟的思想家們，大家都在那裏從基本上，從理論上，從哲學上，對現在國家經濟政策作一個根本的批評，以便對症下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我今天帶來了一點材料，就是在兩年前，我在外國時，有一位朋友寫給我一封討論這些問題的長信。（這位朋友是公務員；爲了不願意替他闖禍，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他這封信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基本的討論，和海耶克、方米塞斯、殷海光、高叔康諸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樣。因爲這封信很長，我只能摘要報告。他首先說：「現在最大的問題：大家以為左傾是當今世界的潮流，社會主義是現時代的趨向。這兩句話害了我們許多人。大家聽到這個很時髦的話，都以為左傾是當今的一種潮流，社會主義是將來必然的趨勢。」他就駁這兩句話，不承認社會主義是現時代的趨向。他說：「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业。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我念這封信的意思，就是表示我們中國在國內的學者，在國外的學者，在幾年前已有慢慢轉變過來的意思了。他又說：「我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現在了解社會主義只是一種不徹底的共產主義。牠的成功希望，遠遠不如共產主義爲大。」在這幾年來，老牌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澳洲、紐西蘭等，都相繼的拋棄了社會主義。兩年前英國的勞工黨自選舉失敗後，也離開了社會主義。當時〔紐約時論〕的社論說：「現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只剩



下了瑞典和挪威兩個國家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拋棄社會主義而歸向資本主義是一個很普遍的趨勢。

不過我個人也有一個懺悔。現在我的「胡適文存」第一到第四集都已在臺灣印出來了，是由臺灣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給我印的。「胡適文存」第三集的開頭載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那篇文章是我在民國十五年的一篇演講錄。我那年到歐洲，民國十六年到美國，也常拿這個話講演；以後並且用英文重寫出來印在一部頗有名的著作「人類往何處去」(Whither Mankind)裏，成為其中的一篇。我方才曾提到那位我在外國時寫信給我的中國朋友在信中指出來的許多中國士大夫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看法。

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說的話也是這樣的。那時候我與這位朋友所講的那些人有同樣的錯誤。現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國十五年六月的講辭中，我說：「十八世紀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作懺悔。諸位如果願意看我當初錯誤的見解，可以翻閱「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一篇，題目是「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為什麼這班人變了呢？為什麼在臺灣的許多朋友，如殷海光先生、高叔康先生變了呢？為什麼我那位朋友寫幾千字的長信給在國外的我，表示我們應該反悔，變了呢？為什麼今天我也表示反悔，變了呢？我這裏應該聲明一句：我這個變不是今天變的。我在海耶克的書以前好幾年已經變了。諸位看過在「自由中國」的創刊號有張起鈞先生翻譯我的一篇文章：「民主與極權的衝突」，但是沒有記上年月。其實那是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講演的文章，原題目是「Conflict of Ideologies」(「思想的鬭爭」或「思想的衝突」)。這裏面有一句話：「一切的所謂社會徹底改革的主張，必然的要領導到政治的獨裁。」下面引一句列寧的話：「革命是最獨裁的東西」。實在，要澈底的改革社會制度，澈底的改革經濟，沒有別的方法，祇